

《贞观政要》

领导艺术

安立志 著

历史的
启示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贞观政要卷第二

論任賢三

論納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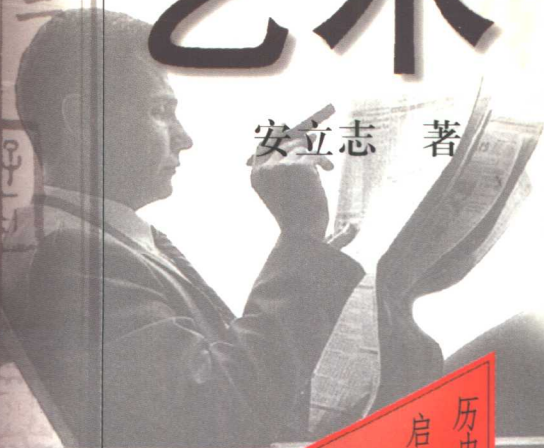
任賢第三章

房玄齡

李靖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諱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

上。與力。德。走。公。同。上。親。我。朱。火。



《贞观政要》

与领导艺术

安立志 著

历史的
启示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開皇中。清大。房玄齡。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清大。

李靖

公齡

第三凡八章

五三

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明权

装帧设计:严克勤

历史的启示

《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

安立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申光制版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875 插页 5 字数 210,0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550-3

G·146 定价:13.50 元

目 录

◇载舟之水——民本篇◇

舟、鱼、蛙与水之关系	1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5
贵顺物情	9
“割股啖腹”说	13
张玄素的论据	17
皇帝吃蔬菜	22
弓喻	26

◇正本清源——廉政篇◇

从上做起	31
爱财	35
“常惧”论	39
戒奢	43
防微杜渐	47
钓饵	51

“外助”问题	55
◇以人为镜——兼听篇◇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59
“镜”说	63
态度问题	68
“没意见”心理种种	72
魏徵的实话	77
◇选贤与能——举贤篇◇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81
何以辨“堪否”	85
论“德才”	89
六正、六邪	93
“马周”问题	98
说“长”道“短”	102
封德彝目中无人	106
◇赏罚察用——吏治篇◇	
何止“十羊九牧”	111
不疑、不蔽、不私	115
礼下与辱下	119
拜谢什么	124
制衡机制与监督意识	128
赏善罚恶	132
重视地方干部	137

◇法网恢恢——法制篇◇

“刑赏”别论	141
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144
张蕴古之死	148
杨誉竞婢	153
贾崇案的反思	157
程序问题	161

◇审时度势——决策篇◇

一日万机,独断一人	165
令出惟行	170
重在“谋势”	174
房谋杜断	178
略谈“力排众议”	182
渭水桥头	187

◇中正诚信——公平篇◇

诚信论	191
戴胄断案	195
豫让之见	198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203
皇叔之怨	207
带刀入阁风波	211
魏徵辩诬	215

◇笃学求真——求实篇◇

太宗谈读书	221
文“化”人	226
慎出文集	230
不务虚名	235
赵元楷其人	239
不做“三旨相公”	244

◇克己明德——正身篇◇

十思论	249
金玉论	253
齐桓公现象	257
谦虚简论	261
“自知”与“知人”	266
推功臣下	270
慎言语	274

◇思接千载——史鉴篇◇

洁本	279
说“自传”	283
触景生情	288
错位	292
走出沼泽地	296
“古”鉴	300
创业与守成	304

后记	308
----------	-----

载舟之水——民本篇

舟、鱼、蛙与 水之关系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政体》

粗读《贞观政要》，有关舟水关系的论述，主要有两处：一在《政体》，一在《君臣鉴戒》；一在贞观六年，一在贞观十四年；一为“古语云”，一为“孙卿子曰”。两处均见于魏徵给唐王的奏折中，引文大致差不多。意思也较为浅显：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当然，这个意思，在魏徵的《十思疏》中也有表述：“载舟覆舟，所宜深慎。”^①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一些有识之士朴素的民本思想。孙卿子（即荀况）是战国时人，比他更早一些的春秋时代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曾经作过

^①《贞观政要·君道》

更为准确的描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①不知这是否荀子“舟水理论”的思想嚆矢。

李世民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乱世”中夺得政权的，他亲眼目睹了民众在改朝换代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巨大威力，从而深深地产生了对此种伟力由衷的敬畏。魏徵作为同一时期另一股政治力量帐下的幕僚，当然也懂得这层道理。这就是在隋末唐初这个特定时期，这个话题被反复提及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因素。

“舟水之论”反映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能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依赖、互动），这固然体现了中国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睿智；然而，从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来看，这种“舟水关系”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的倒是它的对立性质。我以为，这就是前贤先哲总在“载”与“覆”上作文章的思想底蕴。

苍狗白云，斗转星移。同样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社会分工而言，尽管仍然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野，但是从根本上说，已经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在这个社会里，原则上说来，官员与公民，干部与群众，尽管在哲学上仍然是对立统一关系，但矛盾的根本性质和主导方面，主要体现在统一这个层次。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个非常通俗的表述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然还有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种种说法。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新时代的干群关系，应当是彼此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而不至于出现“覆

^①《管子·牧民》

舟”关系。梁衡的散文《红毛线,蓝毛线》描述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他说,在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炕上至今还放着一辆纺车。领袖们走过雪山草地,大都到过东洋西洋,他们统率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①

其实,鱼水关系,并非今人的创造,能够查到的根据仍是《贞观政要》。在《君臣鉴戒》一章中,有魏徵引孔子的一句话:“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过,这个比喻的深层含义并非是说皇帝与平民具有什么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它所揭示的道理在于,“鱼”离开了水就是死路一条,而水仍然还是水。这与“舟”可能的“载”与“覆”都不可能改变水的地位与性质是一样的。这似乎是对一种不可知力的恐惧,也正好说明旧时开明君臣对人民的伟大力量的油然而敬畏。

似乎与时代的进步构成了一种反差,当今时代,一些本来处于“鱼水结构”中作为“鱼”的角色的扮演者的领导干部,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鱼”“进化”为“蛙”。这种“进化”似乎并不像从水生脊椎动物到水陆两栖动物那样简单。鱼生有水中呼吸的器官——鳃,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一旦脱离了水,鳃

^①《新华文摘》1997年第11期

就不能发挥作用,鱼就会窒息而死。“涸辙之鲋”哀求庄周道:“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①即说明鱼离开了水,就会大难临头。而蛙则不然——除开蝌蚪阶段——蛙的鳃退化而为肺,于是可以到陆上呼吸,必要时也可下水。于是,蛙被名之曰“两栖”。自然界的现象无所谓对错。奇怪的是,阎浮世上,一些背着“共产党员”招牌的领导干部,也完成了这种从鱼到蛙的“进化”。这种“进化”的实质是淡忘了“公仆意识”,脱离了“鱼水关系”。其表现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了青蛙对待水的态度:需要时跃入水中,不需要时则跳到岸上。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热衷于“上午乘着车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早已习惯了“岸”上的生活。再比如,有些领导者临近选举或上级考察,他们就极不自然地放下架子,摘下脸谱,搁下官腔,这里和颜,那里悦色,此处嘘寒,彼处问暖,仿佛他原本就是水生动物,殊不知等“选票”到手,“乌纱”戴定,就又跃出水面,钻入轿车,只闻得“酒席筵上说丰盛,听取蛙(哇)声一片”了。^②

“鱼水关系”较之“舟水关系”,无疑表明了历史的进步。然而,从“鱼水关系”到“蛙水关系”,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进化,将此称之为退化似乎更为确切。在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都应珍视和保持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鱼水关系,关心群众,勤政为民,“不作青蛙岸上叫,要作鱼儿水中游”,如同安泰落回大地,才能真正获得力量。

^①《庄子·外物》 ^②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句,改其意而用之。

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辨兴亡》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时为黄门侍郎的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都饥饿困乏。虽然国家的粮仓很满，杨坚竟不允许开仓救济，却让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自己找饭吃。隋文帝不爱百姓只惜仓库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于到他死的时候，国家储积的粮食，竟可以供给全国的百姓吃五六十年……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而不在于装满国家的仓库。古语云：‘如果百姓的用

度不够,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后面这句“古语云”,出自于《论语·颜渊》,是圣徒有若先生回答鲁哀公的话。

在中国,有一个思维传统,确认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往往不是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是先确定是否来自于权威或来自于圣贤。我之所以看重这句话,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例子可能会对于一些领导者的某些观念带来根本性质的拨乱反正。哪种观念呢?那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在我国比较流行。一些领导者确信并传播这种观念,当然可以有公开的或隐讳的、光明的与阴暗的各种理由,即使这样做可能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政绩,树碑立传,但在公开场合却是教育下属与百姓,要“顾全大局”,“努力奉献”。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为本位的国度,且不说集体主义本位与个人主义本位有什么优劣之分,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在通常情况下,强调集体利益,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思维方式,所体现的正是—种集体与个人的对立,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个人利益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干脆不存在的理由,或忽略不计,或使之泯灭,或予以消灭。

如同朱元璋修改《孟子》,某些思想家和领导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口号下,不知怎么单单就把这一条遗忘了。对于这样一条由圣贤立言(因其见之于《论语》),由权威倡导(因系李世民重申)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比之于上述的“大河小河论”,更接近于辩证法。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个提法与“大河小河论”其实是对立的。这种提法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如果用“大河小河论”

这种句法来套的话,应当是这样一种格局:“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对于这样一种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界基本事实的说法,可能是一些仍然抱着尽管歪曲了自然规律但仍被奉为圭臬的思想观点的领导者所无法接受的。因为这的确牵扯到一些领导者所谓“主人”与“公仆”真实地位的互变,从而使自己失去向下属和百姓进行教育和灌输的一个基本论据与手段。

其实,这个思想也不仅仅属于有若先生,当然更不属于李世民。如果将这个思想通俗化为“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话,那么,在庄子则有“江河合水而为大”^①;在荀子则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②;在墨子则有“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③;在李斯则有“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④;《后汉书》则有“涓流虽寡,浸成江河”^⑤。举出这许多例子的目的,无非在于使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真正了解大河之水是由小河之水汇聚而成的,国家的富强是以百姓的富足为前提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将其中的“君”替换为“国”,所表述的也仍然是这个道理。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君即朕,“朕即国家”。确立这样一个基本的哲学观非常重要,它有助于从我们的领导科学的词汇中彻底剔除“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以颠倒因果、歪曲事实为特征的思想观念。

在我们的国家里,要确立一种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从马恩著作中寻找根据。辩证哲学的三大规律中有量变质变规律,即只有量的积累才会产生质的飞跃。

①《庄子·则阳》 ②《荀子·劝学》 ③《墨子·亲士》 ④《谏逐客书》
⑤《后汉书·酷吏传》

而量的积累本身,又有一个从多到少、由小到大的过程。这就有必要让人们认清,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背离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却又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真理炫耀。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不清醒,这里有许世友将军的一则故事。5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最后一次回故乡看望当时衣着褴褛、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离家之前,当地的党政官员请他谈谈对家乡的感想和要求。他板着黑沉沉的脸说:“连老祖宗都知道,民富才能国强……你们说什么‘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大河里无水小河里干’,糊涂虫,应该颠倒过来,‘小河里有水大河里满,小河里无水大河里干’。”有人轻声反驳:“我们是讲锅里有,碗里才有。”“锅里有?锅里的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老百姓碗里挖来的。咱们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学会了自己骗自己?不要为了邀功升官,坑害百姓!”^①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高风亮节。在这一点上,“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才得到了正确而深刻的诠释。

^①《南方周末》第603期

贵顺物情

贞观元年，太宗谓使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dú）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

——《俭约》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们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开凿九山，浚通九河，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因为民心希望这样做，他集中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批评，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与民心不一致的缘故。”在这段对话中，所反映的思想，至今看来，也还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对“贵顺物情”有意或无意的崇尚和追求。“物情”也者，据《辞源》解释，1.物理人情。2.众望，人心归向。因此，这句话通常

可以理解“重视顺应民心”。

李世民在这段议论中,采取了正反对比的手法,以说明“贵顺物情”之重要。同样是兴建工程,同样要耗费民力,大禹凿九山、通九河,但百姓并没有怨言;而秦始皇造宫殿、修陵墓,却搞得民怨沸腾。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前者是“物情所欲,众所共有”,而后者则是“徇其私欲,不与众共”。就是说,前者顺应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后者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背离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

历代帝王往往过分相信自己的“天纵英明”,迷恋自己的“君权神授”,这种九五之尊、天下一人的心态和地位,使之产生了错觉,似乎只有权力才是一切,以致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段,看起来好像不可一世,然而从历史长河的整个过程来看,个人不过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在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问题,倒是“顺民者兴,逆民者亡”。这从李世民反复提及的秦始皇和隋炀帝那里可以得到明证。

李世民这个思想,在其子孙那里,多多少少还是得到了贯彻的,比如李隆基、李昂等等,不然有唐一代也不可能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在这里,尤应一提的是陆贽这个人。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783年),有一位后来成为丞相并被后世称之为政论家的陆贽先生。有一次,皇上李适问陆贽“以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今切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即治,唐代避高宗李治讳,以